

## ※序跋選錄※

# 《唐宋詞彙評·兩宋卷》序

吳熊和\*

近一兩年，我的工作主要是試圖為《全宋詞》編年開個頭。

宋人詩集，尤其是大家名家的，不少是親自編定並按年代為序編排的。他們的生平行跡，借助編年詩而可以得其大概。這為後世的研究帶來了莫大的方便。為兩宋詩人作年譜傳記，往往賴此而能夠做到翔實可信。這是我們讀宋人詩集常常得到的好機緣。唐人詩集則很少提供這種先例，像白居易那樣兼用分類與編年的方法，親自編定《白氏長慶集》，僅是個別的例子。李白、杜甫的詩集，全靠宋人不斷採集補充而終於完善的。其編年更要到清人、近人手中，才大體葺事。可是兩宋詞集，與宋人詩集的情況就大為不同。由於北宋詩文集概不收詞，北宋諸家詞集均別出單行。北宋詞人別集，如張先作序的晏殊《珠玉詞》，黃庭堅作序的晏幾道《樂府補亡》，張耒作序的賀鑄《東山樂府》，周邦彥、田為作序的萬俟詠《大聲集》，皆世無傳本。原書如何編定，已不得其詳。現傳北宋詞集，或按宮調編排，或按詞調編排，大都為南宋時傳刻。詩文詞三者合編，至南宋已經盛行。南宋人的詞集，就每附詩集印行。但兩者的編排體例仍然各依舊例。陸游《劍南詩稿》八十五卷，全是編年的。《渭南詞》兩卷，則為分調而無年月之序。范成大《石湖詩集》三十四卷也是編年的，《石湖詞》兩卷仍分調而列。南宋詞集編年的，也有數家。

---

\* 吳熊和，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退休教授。

編按：本文為《唐宋詞彙評·兩宋卷》之序言。《唐宋詞彙評》包括唐五代卷及兩宋卷，兩宋部分由浙江大學教授吳熊和先生主編，參與編纂者尚有沈松勤、陶然、胡可先、李劍亮等四位先生，2005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。此書是以《全宋詞》為底本之資料彙編，作者部分收傳記及年譜資料，並有詞人之總評，作品之後則收各詞之評論。其能編年者並予以重編。其後並附錄王國維《詞錄》、清人論詞絕句、《高麗史·樂志》所載北宋詞曲等罕見資料，俱為論詞之重要材料。

魏了翁《鶴山先生大全集》卷九十四至卷九十六為詞集，共一百八十六首，大體編年。《開慶四明續志》卷十一、十二錄吳潛詩餘兩卷，一百零七首，為寶祐四年丙辰至開慶元年己未時作，後人輯為《履齋詩餘》，年代亦一一可考。郭應祥《笑笑詞》一百二十餘首，起於開禧元年，終於嘉定三年，亦依作年為序。不過按調編排，一直是南宋詞集的通行慣例。南宋編定的近百家詞集，大率有分調而無編年。詩集編年使歷代研究者獲益良多，詞集分調井然而時序錯亂，則為後人了解詞人行實與作品時地造成重重障礙。

不過，有些宋人年譜，在為譜主詩文編年的同時，也偶及其詞。王宗稷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，傅藻《東坡紀年錄》，於蘇詞即是如此。清代王文誥《蘇詩總案》，踵事增華，蒐討甚廣，實際上就包含《蘇詞總案》在內。有了這些憑藉，一九一〇年朱孝臧完成了《東坡樂府》的第一個編年本，後刊於《彊邨叢書》。

二十世紀的詞學研究，超軼以往。許多信而有徵、燭幽察微的兩宋词人年譜與詞集編年絡繹問世。夏承燾先生之於《白石詞》、鄧廣銘先生之於《稼軒詞》、羅忼烈先生之於《清真詞》，皆難度甚大而創獲豐碩，沾溉後人，足為典範。但是，剩下的難點與空白點，仍然不少。像北宋的柳永、南宋的吳文英這樣重要的詞人，均因名位不彰，文獻匱乏，至今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研究成果。傅璇琮先生主編的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，匯聚與綜合了當今對唐代詩人近四百家的最新考索所得。宋詞研究中，也應該有規模水平與之類似的學術著作繼之而起。

七十多年前，夏承燾先生曾打算從宋词中選取十家，「為白石、稼軒、山谷、淮海、片玉、樂章、龍洲、後村、東坡、六一諸大家作疏證，名《十種宋人詞疏證》」<sup>1</sup>。《白石詞》一種先成，另外九種，或因其他學者著鞭在先，無須措手；或因精力轉移，因循未果。然而，現今為兩宋名家詞作疏證且有編年的，遠過於上述十家，業已問世的，不下二、三十種。東坡、片玉、稼軒及李清照的《漱玉詞》，且有多種編年本。儘管各有短長，都反映了當代詞學研究所取得的新進展。學術研究是需要先後傳承與不斷積累的，沒有歷代研治宋史所夯實的深厚基礎，沒有包括近年來詞學研究的一系列收穫，是不敢不知輕重貿然妄言地為《全宋词》編年的。

<sup>1</sup> 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1929年8月30日，引自夏承燾：《夏承燾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第5冊，頁116。

因此，現在需要做的，一是為已有的宋人詞集編年聊為補苴，二是把有待編年的範圍擴大到《全宋詞》。從前者來說，它不過是繼續，即繼續接手前人未竟之業。從後者來說，它又是開始，即開始在更大範圍內為宋詞編年。當然，為宋詞編年，是一項學養相濟的基礎性工作，絕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不僅期待天假以年，更期待樂於此事的年輕俊彥，有因有革地來完成。

短期內寫出的若干宋詞編年，選擇部分作為本書附錄。從附錄部分編年中，已有不少有益的發現，開闢了一些應知而未知的領域。這裏試舉數例。

首先，以詩證史，詩史互證，是唐詩中常見的研究方法，已有許多出色的學術範例。這種方法同樣適用於宋詞。夏承燾先生的《宋詞繫》與《龍川詞校箋》，詞、史互補，相得益彰。茲從近來所從事的宋詞編年中試舉兩例。

李綱有一首〈江城子〉「池陽泛舟作」<sup>2</sup>，作於宣和三年(1121)，涉及方臘起義。李綱時自南劍州沙縣(今屬福建)稅務任上罷職歸無錫，方臘軍占領杭州後，由閩入浙前去無錫的道路，已為兵火所阻，不得不從遠道迂迴，從九江輾轉經繁昌、蕪湖、銅陵，江行至建康。詞的下片云：「梁溪只在太湖東。長兒童。學龐翁。誰信家書，三月不曾通。見說浙河金鼓震，何日到，羨歸鴻。」這是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在宋詞中留下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蹤影，時代感很強。

端平入洛是南宋後期的一個歷史轉折點，為宋與蒙古戰爭的開端。端平元年(1234)七月，宋軍乘金亡北上，進抵洛陽。李曾伯隨淮西軍抵達潁州，中秋於潁州南樓作〈喜遷鶯〉(輕雲暮卷)詞<sup>3</sup>。潁州在北宋時一直是晏殊、歐陽修、蘇軾等詞人遊宴之地，潁州西湖更常見於北宋吟詠。在淪陷二百餘年之後，突然再現於李曾伯詞中，值得南宋詞史為此提上一筆，也是端平北伐在詞中留下的一個標誌性的史跡。李曾伯還有〈醉蓬萊〉「丁酉春題江州琵琶亭，時自兵間還幕，有焚舟之驚」<sup>4</sup>，作於嘉熙元年(1237)；〈水調歌頭〉「乙巳九月壽城獲捷，和傅山父〈凱歌〉韻」<sup>5</sup>，作於淳祐五年(1245)，都是宋軍抗元的前鋒紀實，可補史書之闕。

其次，有些詞人的生卒年，向無可考，現今從宋詞中找到依據。亦舉兩例。

<sup>2</sup> 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)，第2冊，頁906。

<sup>3</sup> 同前註，第4冊，頁2806。

<sup>4</sup> 同前註，頁2787。

<sup>5</sup> 同前註，頁2799。

晁公武的《郡齋讀書志》是版本目錄學名著，歷來嘉惠士林。但晁公武《宋史》無傳。宋時李燾曾撰《晁公墓志》，惜已久佚。故他生於何時，苦無可考。清錢保塘《晁公武事略》，蒐採甚備，然生卒年仍付闕如。近人孫猛《郡齋讀書志校證》，於前言中推斷他「大約生於宋徽宗崇寧年間(1102-1106)」<sup>6</sup>，亦無實據。《全宋詞》從《翰墨大全》丁集卷一輯得劉光祖〈沁園春〉「壽晁帥七十」<sup>7</sup>，則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據。劉光祖(1142-1222)，字德修，簡州(今四川簡陽)人。乾道五年(1169)進士。趙萬里輯有其《鶴林詞》一卷。乾道四年三月，晁公武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，故劉光祖壽詞稱為「晁帥」。乾道六年三月，罷安撫使。八月，除淮南東路安撫使兼知揚州。劉光祖這首〈沁園春〉，即作於乾道五年，晁公武是年七十歲，據此上推，則生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(1101)。比孫猛的推斷略為提前。晁公武的生年據此則可以確定。

吳文英的卒年，因無確據，一直難以遽定。夏承燾先生《吳夢窗繫年》疑其卒於景定元年(1260)，且謂：「吳潛被毒死與賈似道造後樂園，皆在景定三年(1262)。度宗即位，嗣榮王趙與芮加封武寧軍節度使，在景定四年，《夢窗集》中皆無一語，疑其已不及見。茲定夢窗卒於此年前後。」<sup>8</sup>按吳文英有一首〈水龍吟〉「送萬信州」<sup>9</sup>。信州，今江西上饒。萬氏為誰，朱孝臧《夢窗詞集小箋》，夏先生《夢窗詞集後箋》，楊鐵夫《吳夢窗詞箋釋》，三家皆無考，無從斷其作年。從新近出版的李之亮《宋代郡守通考》中終於找到答案。其中《宋兩江郡守易替考·信州》咸淳元年至三年(1265-1267)，知信州為萬益之。據《江西通志》卷四十九：「萬益之，南昌人。紹定二年(1229)黃樸榜。信州太守。」<sup>10</sup>在整個南宋期間，知信州者姓名一一可考。萬姓而知信州者，僅萬益之一人。又《光緒道州志》卷四〈守臣題名〉：「萬益之，寶祐元年(1253)任。」是萬益之先知道州，後知信州。《弘治撫州府志》卷九〈縣令題名〉：「崇仁縣：萬益之，淳祐二年(1242)。」其為崇仁縣令，時間更在前。《萬曆新修南昌府志》、《康熙永州府

<sup>6</sup> [宋]晁公武撰，孫猛校證：《郡齋讀書志校證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)，頁1。

<sup>7</sup> 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，第3冊，頁2065。

<sup>8</sup> 夏承燾：《唐宋詞人年譜》，引自《夏承燾集》，第1冊，頁477-478。

<sup>9</sup> 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，第4冊，頁2880。

<sup>10</sup> 李之亮：《宋兩江郡守易替考》(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1年)，頁204。

志》卷六，亦皆有萬益之的記載。由此可知，至少萬益之於咸淳元年赴信州任時，吳文英猶在世。〈水龍吟〉起句：「幾番時事共論，座中共惜斜陽下。」以「斜陽下」喻國運衰頹，是吳文英暮年有增無減的憂患之心。他與萬益之「時事共論」，或許正包括與吳文英有知遇之感的吳潛被賈似道毒死等諸事在內。咸淳元年至南宋滅亡，不過十一、二年。

為《全宋詞》編年中有所收穫的，當然不止上述這幾條。而且，對《全宋詞》編年，不是為了一時一家，而是便於對宋詞作整體的綜合研究。本書採用的也只是近期初步考索所得。《全宋詞》編年成書後，將單獨出版。

本書收有幾種附錄，亦在此略作說明。

一、王國維《詞錄》。一九〇八、一九〇九兩年，王國維在北京專力於詞曲研究。他鑑於吳昌綬所作《宋金元現存詞目》，僅錄存世宋人詞集而不及亡佚，且為宋詞導夫先路的唐五代詞集概付闕如，故在彙輯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》之餘，以吳昌綬書目為基礎，「存佚並錄」加以擴充，上起於唐，下訖於元，為《詞錄》一書，共錄唐宋金元詞集三百二十九種，較之清初朱彝尊《詞綜·發凡》所列，已多出二百多種。《詞錄》與王國維緊接著成書的《曲錄》二卷（共收戲曲二千二百二十種），是堪稱雙璧的姊妹篇。然《曲錄》早經刊出，為戲曲研究者所熟知。《詞錄》則為世罕聞，趙萬里〈王靜安先生著錄目錄〉猶云「未見」。其實《詞錄》手稿一直為羅振常所珍藏，上海圖書館亦藏有手稿的複印本。本書今謹予披露，相信定會引起詞學研究者的興趣和關注。

二、清人論詞絕句。杜甫〈戲為六絕句〉開創了以七絕形式論詩的先例。嗣後論詩絕句蔚為風氣，歷代不絕。郭紹虞、錢仲聯、王蘧常合編的《萬首論詩絕句》凡四大冊，就彙集了自唐至清的絕大部分作品。論詞絕句或許可以黃庭堅〈寄賀方回〉為肇始。雖宋元作者不多，清代則已盛行。尤其自厲鶚〈論詞絕句十二首〉（作於雍正十年）之後，繼之者蜂起。不過，清人的論詞絕句散見於為數眾多的詩文別集，蒐輯頗為不易。趙尊嶽藏有況周頤的《論詞書目》，共錄王僧保、周稚圭等七家，三百三十二首<sup>11</sup>。唐圭璋先生一九三四年的《詞話叢編》擬目中，分甲乙兩編，乙編即有趙尊嶽輯《論詞絕句》一卷<sup>12</sup>，似即本之況周頤《論詞書目》。然

<sup>11</sup> 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1930年11月19日，引自夏承燾：《夏承燾集》，第5冊，頁168。

<sup>12</sup> 唐圭璋：〈詞壇消息·詞話叢編之校印〉，《詞學季刊》第2卷第1號（1934年10月）。

其書從未刊出。本書所輯清人論詞絕句，比況周頤所輯較多擴充，凡二十八家，五百九十五首。雖然蒐輯頗費時力，但仍有遺珠之嘆，希望今後能再予補訂。清人詞話眾多，但作者大半非詞家名家，自具體系、見解高超的並不多見。清人論詞絕句卻多為作詞高手，往往措辭精粹，獨具真知灼見，屬於名家詞論詞評。因此，清人論詞絕句與清人詞話，兩者同樣是清代詞學昌盛的重要一翼。研究清代詞學，光注意清詞話而忽略清人論詞絕句，不免有囿見聞而招致學術損失。本書作為專輯附錄，以期引起同好並開展研究。

三、《高麗史·樂志》所載北宋詞曲。朝鮮鄭麟趾等撰《高麗史》，凡一百三十九卷，刊於明景泰二年(1451)。高麗稱本民族音樂為「鄉樂」，稱中國音樂為「唐樂」。《高麗史》卷七十一〈樂二〉「唐樂」部分，記載了北宋徽宗時傳入的中國樂曲，有大典七套，曲詞三十首。雜曲包括小令長調，四十四首。大曲是大型歌舞曲，其舞隊往往有數十人，有樂官用多種樂器演奏樂曲，歌妓一人或數人唱聲樂曲，邊歌邊舞，進退如儀，場面相當熱鬧。《高麗史·樂志》所載「唐樂」，不僅是研究北宋與高麗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，也是研究北宋詞曲與樂舞的重要資料。雜曲四十首，有柳永、歐陽修、蘇軾等名家之作，也有一些詞並無主名，可以補中國本土詞的缺失。唐圭璋、王仲聞二先生所編《全宋詞》，於大曲七套僅錄其曲詞，其舞隊人員、樂舞始末、口號致語，皆棄而未錄，本為動態的歌舞變成靜態的書面文辭，這固然是限於《全宋詞》一書的體例，但僅從曲辭是難以窺見大曲演奏的整套程序及藝術風格的，不免令人遺憾。故謹彙錄於此，以供參閱。雜曲四十首，本不注明作者，其中有十五首作者可考，附注於後。其中柳永詞八首，高居首位。這十五首詞，《全宋詞》因避免重出未予收錄，但它們提供了在高麗的傳唱情況，且兼有文字校勘價值，故一概收錄。

四、《瞿髯論詞絕句》。近現代人論絕句，亦復不少，而且還從絕句論詞，發展到詞中小令論詞，如張德瀛有〈望江南〉論詞十五首，朱孝臧有〈望江南〉「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」二十六首<sup>13</sup>，盧前有〈望江南〉「飲虹移論清詞百家」一百首。近現代人的論詞絕句和小令，比之前人更具歷史眼光和時代感，評論也更為客觀，可以從中了解詞學的變化和進展。夏承燾先生晚年所作的《瞿髯論詞絕句》

<sup>13</sup> 饒宗頤：〈朱彊邨論清詞望江南箋〉，《文獻：文學史論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1年），下冊，頁751-785。

九十三首，無疑是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至於廣泛蒐集彙輯近人論詞絕句與論詞小令，則俟諸異日。

本書的編撰宗旨體例，見於〈編撰說明〉，無須多贅。這裏只就編年與附錄部分略作補充介紹。本書的編撰歷時多年。浙江省教育出版社鄭廣宣先生一直給予關心幫助，熱忱可感，並此致謝。